

悄悄散去的

幕纱

明代文化历程新说



陈宝良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





悄悄散去的幕纱

明代文化历程新说

陈宝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羊角丛书 ·

悄悄散去的幕纱

——明代文化历程新说

陈宝良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南路关家坟)

航空航天部西北电脑排版公司排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潼南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8.25 印张 5 插页 150 千字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690

ISBN7-5419-0685-9 / G · 610

定价：3.60 元

《羊角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8年8月)

名誉主编 黎澍

主编 赵喜民 孙晓

副主编 陈绪万 韩养民 苏君

编委 牛克成 刘孟泽 孙晓*

陈绪万 李宝生 杨明

杨念群* 苏君 张毅

张首映 罗传芳 赵喜民

章义和* 黄金山 彭林*

韩养民 廖广州

(按姓氏笔划为序，加星号

者为常务编委)

F G 24/10

序

最近几年形成了一股文化史热，特别是探索明清文化大有一哄而起之势。正如一讲开放搞活，既会出现埋头苦干、力图创新的改革家；也会冒出一批手持皮包、袋藏总经理名片的投机者，在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分野，有不畏艰难向上攀登的执着追求者，也有靠几声空喊、些须引进而跻身于史学家之列者。这在文化史领域里也不乏其人。正所谓趁潮而起，鱼龙混杂，无须大惊小怪。

我由于在大学执教，同青年学生和朋友们接触多一些，知道他们当中许多人刻意求新。这原是不错的。几千年沉重的思想绳索至今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也被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弄成了僵化的东西，为己所用。把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视作经典，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原意。历史在发展，世界在前进，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总结和汲取整个人类不断更新的文化成果，在各个领域里把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想阻挡的人

· ·

只能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然而，任何研究工作中真正新的进展，都是科学的，也就是说它必须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蜚语惊四座，信口尽雌黄”，也可能显得颇有“新”意，耸人听闻于一时，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是没有份量的。

陈宝良君的这本著作最显著的优点正是在扎实的功夫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新论点。它不仅在现时很有新意，到将来仍有其参考价值，因为它提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明代文化所达到水平的一个范例。作者在纵向把握整个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横向分析各流派的特色上，都能独抒己见，不落前人窠臼。做到这一点是认真阅读了大量明代文化书籍，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研究作出的总结。至于文字的流畅，内容的深入浅出，读者自将有所体会。

在学术上，大凡提出一个论点总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呈现为聚讼不休。这种现象我以为是正常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强求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宝良君在本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立论上过去有分歧，今后也仍然会有不同看法。比如以资本主义萌芽作为阐述明中期以后思想文化革新的社会背景，导致异端思想和市民文学的出现，等等。专门收集这方面讨论文章的集子在我国已有四部。论之者说有，攻之者说无，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中期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无疑是个事实。仅以商人

而言，历来为官僚士大夫所不齿，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认为文坛盟主的王世贞对朋友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这位朋友回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王世贞无言可对，只好付之一笑。这个小故事说明，王世贞虽然清高自命，却看到了徽州商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了文化上的追求；而他的朋友却看得更深刻，过去以圣贤之徒自居的文人正在朝着拜金主义者演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局面显然已不适应当时的潮流。宝良君的著作正是阐明了包括这一潮流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流派衍化的轨迹，至于用什么名词来概括，那是作者的权利。

顾 诚

1988年1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编者献辞

忘掉的一切又重新拾起。如同一首歌，一只带血的喉咙，一串用剪刀剪断又重新复结的心灵的碎片。坦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羊角丛书》就是我们用这些碎片编织的一束心灵之花。

《羊角丛书》是思考的丛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躁的时代。新旧文化的撞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股股旋流，观念的更新远过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焦躁使我们骜趋新奇，而对任何都不加深思地一略而过；焦躁使我们常常产生救世主般的激情，而后由于某种失意则怨天尤人，心灰意冷；焦躁使我们不能平静地安放自己心灵，仔细审视我们的过去，严肃思考我们的未来。从思想解放至今，我们走过了从敏感感到呐喊、怀疑、信仰淡薄、理想式微这一过程。我们似乎深深陷入一种命定式的痛苦。我们已应该理解，在这个时代，呐喊是苦涩的，怀疑和对怀疑的怀疑会让我们失去信心，谢绝自己的使命。然而，诚实的思考不应羞愧。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代。

《羊角丛书》是研究人的问题的文化丛书。

人是文化的主体。这个丛书以分析积淀在中国人身上丰富的精神文化为主旨；以研究中国人的心灵、情感、道德和生活习俗为内容。它注重实证与介绍，力求对民族精神中深层文化内涵进行一些有益的和新颖的剖析。它赞赏一家之言的学风，相信读者的智慧。它不是赠送读者的一把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而是在每本书提供的不同文化现象中，与读者一起提问、思考、启发，共同理解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中国人。

羊角古汉语意指曲而上升的旋风。出典于《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书名羊角，表达了我们编委会的志向和追求。现在，全国文化研究热潮方兴未艾，愿我们的丛书能在这热潮中掀起一卷卷闪亮的浪花。

《羊角丛书》编委会

1988年8月

目 录

序	顾诚	(1)
1 绪论—明代文化的动态研究与地域学研究		(1)
2 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		(25)
2.1 文化的保守与封建文化的 短期繁荣		(25)
2.2 宫廷的风致，皇家的气魄 ——官方文化的特质		(41)
3 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		(51)
3.1 私欲的认可与人格的独立 ——人文主义思潮		(51)
3.2 裙钗入学堂，婚姻自商量 ——妇女解放的风潮		(71)
3.3 世俗的情趣，民间的格调 ——市民文化的特质		(80)

3.4 “言志派”文学与浪漫主义	
文艺思潮 (99)
3.5 慕尚新异，追求艳丽	
—社会风尚的新动向 (111)
4 晚明“实学”思潮的形成与地主	
阶级的文化反思 (125)
4.1 “实学”思潮的理论渊源及	
其流派 (125)
4.2 复古与革新—地主阶级的	
文化反思与自我批判 (189)
4.3 “经世派”文学与批判现实	
主义文艺思潮 (226)
4.4 孤独的人生，感伤的情调	
—清初“幻灭文化”的形成 (239)

1 绪论——明代文化的动态研究与地域学研究

纵观人类文化的发展变革，究其动因和契机，大致不外乎以下两种模式：一为内部生发式。它是由一个特定的文化结构内自身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自身内部结构的发展需要，以及各种文化力量的矛盾撞击，从而提出文化变革。这种变革，既有来自经济基础的终极根源，又有来自理论思维的间接突破。一为外来引发式。它是在两种不同文化层次的交往接触中，由较高层次的一方给较低层次的一方某些影响而引起的文化变革。

明代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必须从动态的角度给以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一原则出发，我认为正德时期（1506—1520年）大致可以作为明代文化变迁的分水岭。随着社会的变异，新经济因素的渐趋产生，思想文化开始由明初的保守、沉闷，逐渐趋向革新、活跃。明代文化在正德前后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这种转变首先属于内部生发式，既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经济土壤的要求，又为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所制约。

探讨整个明代文化的趋向，不难得出如下论断：明代中后期正是一种内部生发与外部引发交相融合、撞击而成的变革时期的特殊文化。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变革时期，既有酝酿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经济土壤的近代人文主义的哲学思考，又有无法超越传统而又代表进步地主阶级的文化反思，还有农民阶级出于自己的经济要求而提出的平等思想，各种阶级力量都试图从自己的基本利益出发，以争夺意识领域里的一席之地。因之，晚明思想文化界呈现出这样一种景象：一方面是社会思潮的混乱，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另一方面在这种混乱的背后又预示了一种共同的趋向，这就是新的思想的诞生。换言之，混乱之中隐藏着一个将要脱胎而出的新世界。这种新思想在晚明时期就体现为一种以“务实”为归趋的“实学”思潮。

同时，从新文化建设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意识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是尽善尽美的，往往是一方面在超越传统，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被传统这一大网紧紧地束缚住。职是之故，这一时期的思想特色就在这种混乱与统一之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怎样透过思想混乱这层幕纱，进而揭示出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质。

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依据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文化的发展不是平稳的、直线发展的，而是曲折的、变化多样的。它大致由平稳的渐进期和剧烈

的变革期两种状况交替组成。就明初文化而言，由于朱元璋一统天下，重新建立了统治全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思想文化的钳制极为严厉。与这种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崇程朱理学，处于一种“述朱”时期，毫无个人的新颖发挥。有人曾这样记述明初思想界的状况：“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①这就造成了明初“有质行之士，而无同异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颛门之学。”^②尊崇传统的伦理规范，亦步亦趋，这在封建道德之士看来，堪称“质行之士”。在文化专制强盛的时代，“共学之方”是文化保守最显著的表现；一旦出现“同异之说”，设立“颛门之学”，就表明文化剧变行将来临。与此同时，明初文学也显得极为幼稚，若比较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晚明冯梦龙的“三言”以及凌濛初的“二拍”，思想以及艺术上的差异即可有力地证明这一论断。内容涉及伦理纲常、名教存亡的戏曲小说充斥整个文学市场，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但又显得雍荣华贵的台阁体诗歌，更是显赫一时。在这种文化气氛下，人们的思想变动极为微小，思想趋于一统，传统受到倍加尊重。

然而，历史已证明这样的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严密的统制，其结果势必造成整个文化结构趋于保守和僵化。明代自中期以后，社会已发生了

极大的变动，“波颓风靡”已是当时世风的一般写照，社会已经到了王阳明所指出的“病革临绝”的地步^③。这不是王阳明的夸大之词。自万历以后，大批思想家都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危机，他们普遍感受到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动摇，“纪纲颓坠”、“纲纪凌夷”、“教化亡”，都是他们总结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危机的简略语^④。

追究程朱理学的根本，实是以“天人相关”或“天人合一”这种“自然法则”的原理为基础，并进而从自然界的原理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实秩序，为封建统治秩序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其实我们细加考察便知，程朱理学的这套理论体系只有当现实的社会秩序本身非常稳定，使人们误认为那就是固定的自然秩序的时候才得以推行。程朱理学在明初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垂青，实有赖于明初社会的安定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固。但是，一至社会的现实秩序失掉其稳定性，封建秩序面临危机的时候，那么程朱理学那种为现实秩序提供基础的逻辑——“自然法则”的设想，必然会陷入无法摆脱的窘境，日渐丧失其原先所具有的威力。换句话说，用自然法则的理论为社会秩序提供现实的基础，其稳定社会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自然法则”得以畅通无阻，也必然要以社会的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为前提。显然，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理论基础的程朱理学，在明代中期这种社会变革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完全陷入僵化、保守的境地。这样，由于文化内部

机制的矛盾运动，必然自发地引起新的文化变革。

在明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变革中，王阳明、李梦阳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这场变革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王阳明开创的“良知”说，在人性论上与程朱理学的“天理”说正好处于一种对立的地位。“天理”主要是对封建伦理纲常进行本体性的论证，藉此证明道德规范的必然合理性；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则旨在说明封建伦理道德的实际可行性，强调的是道德实践、道德情操的迫切必要性。在王阳明论证逻辑的背后，实际上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当这个理论一旦社会化之后，它就成了人们冲击理学禁锢的思想武器。阳明的学说，打破了“迷古”的魔障，给人们以直抒己见的勇气，为晚明思想家挣脱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诚如焦竑所指出，王学一出，“闻者豁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⑤

众所周知，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这样一种平等观：门第无关于一个人的好坏，除了个人的美德之外别无其他高贵身份。固然人文主义的平等观主要源自资本主义土壤的金钱财产关系，但这种对美德的重视，很可证明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性。王阳明的“良知”说，无非为了证明“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一主题，这事实上还类属于道德上的平等观，即属“德性民主”，体现在它背后的还是“圣人”与“愚夫愚妇”实质性的等级差异。但发展至

泰州学派，这种平等观就有了质的改变，开始与近代人文主义归趋一致。

应该指出的是，王阳明的学说，不仅在哲学上成了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也对明代文学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从李贽到公安派诸作家，无不间接或直接地与阳明学说有密切的关系。李贽一向崇拜阳明，袁宏道亦如此。他曾有诗云：“念珠策得定成功，绝壑松涛夜夜行。说与时贤都不省，依稀记得老阳明。”^⑥

李梦阳一向被视为明代“复古派”文学的先驱，在反对以颂扬弘业为职责的“台阁体”文学中，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给后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一直被人忽视的是，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晚明文学新思潮最大的特点就是主张文学应该勇敢地、不受束缚地抒写个人的思想感情。李梦阳曾说：“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⑦宣扬情与理的矛盾，并主张情可以并且应该突破理的束缚。正因为如此，李贽、袁宏道对李梦阳一直十分推崇^⑧。在以前的国内论著中，往往仅把李梦阳视为晚明文学新思潮所反对、否定的对象，缺乏对两者继承关系的实质性探讨。近来已有学者对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一进展基本上解决了以前研究的空白^⑨。

由此可见，明代文化发展到正德年间，由于文化幕后深层的社会经济的变异，更由于文化内部自